

# 粤商传承与走向：一个综述与引申

History and Future of Cantonese Merchants: a Review and Prolongation

申明浩 何 轩

**内容提要** 从秦汉之际开通海上对外交往之路,到近代广州十三行谱写对外贸易篇章,再到当代改革开放时期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范例,粤商充当了对外贸易的中流砥柱和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较早实践了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研究粤商对于中国企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粤商 文化 创业 创新 公司治理

**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420

Shen Minghao He Xuan

**Abstract:** Cantonese Merchants have brought up a remarkable history and glory for the contemporary era, creating wealth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From the foreign trade started in Qin and Han Dynasty, to the Thirteen-Hong of Canton, to setting examples for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 reform-and-opening up period. Cantonese Merchants have acted as a forerunner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mainstay in the foreign trade. They are the early practitioner of China's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Therefore, the study on Cantonese Merchants has an importan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Key words:** Cantonese Merchants,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粤商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我国与世界的经贸交往和中国现代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目前对粤商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白。或许是由于岭南文化低调务实的风格,粤商并没有像晋商、徽商那样被媒体和学者高度关注。现有关于粤商的研究大多从历史人物的角度展开,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规范研究,没有形成富含现实意义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种长期忽视对粤商研究的现状,不能不说是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一大缺憾。这也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所举办“首届粤商论坛”意义之所在。“粤商论坛”旨在更好地总结粤商经验、弘扬粤商精神、传播粤商文化,实现粤商的永续经营及可持续发展。论坛从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对粤商演化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跳出了现有粤商研究停留于人文历史的传记式描述的框架,通过严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粤商样本进行规范的理论 and 实证研究,归纳其成功要素,发掘其成长困境,使粤商个案研究升华为理论结晶,期望能为总结和改善粤商经营管理模式作出贡献。

首届国际粤商论坛于 2009 年 9 月 19 日召开,主题是粤商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来自粤港澳地区的多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围绕会议主题和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涉及粤商困境与成长、文化与传承、创业与创新、家族与治理等方面。

## 一、粤商困境与成长

自古以来,粤商就在中国商界占据主要位置。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粤商就已开始艰辛的海外贸易商旅。近代史上,“粤商”与“徽商”和“晋商”鼎足而立,成为著名的商帮之一。粤商始于贸易业,广州“十三行”曾是中国与世界通商的主力,在中国经济史和世界贸易史上,都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迹。西学东渐使粤商在大力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西方商业思想的影响。岭南地区粤商包容性强,容纳吸收了西方商业文明的结果。近现代香山地区(泛指珠海、中山、澳门等地)粤商创办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成为现代中国百货业和集团公司的先驱<sup>[1]</sup>。现当代的李嘉诚、郭炳湘兄弟、霍英东等著名粤商,成为中国企业家效仿的楷模。

改革开放后,广东商人依靠天时(先行一步)、地利(毗邻港澳)、人和(华侨港澳同胞)之优势,大批现代工商企业应运而生,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外资企业到创办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从搞活国有集体企业到探索混合型企业、股份制企业,粤商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下的李东生、何享健、马化腾等,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粤商杰出代表,他们引领着新一轮粤商振兴的潮流。

然而,金融海啸的冲击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粤商的成长困境,广东的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结构调整和升级迫在眉睫,企业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压力空前巨大。

李新春指出,粤商所处的地利优势消失殆尽,与长三角、黄渤海湾甚至内地的一些地区相比,珠三角的区域经济优势正在丧失,劣势日益显现。产业层问题众多,传统产业主导的优势正在衰落,升级改造压力大;新兴产业裹足不前。粤商企业则存在着战略、制度化管理及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局面。粤商要想在今后的发展中取得突破,必须要完成两个转变,一是从创业家到管理家的转变,二是从管理家到企业家的转变。创业家善于抓机会、具有警觉性、承担风险能力强。管理家更专注,注重学习、制度管理、效率,具有领导力。而真正的企业家是具有战略导向、创新力、较强的软实力、国际化等特点的。

蓝海林认为粤商外向型企业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转型:一是在发展世界级企业方面,占据和整合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内市场可能比低水平的走出去更容易,更具有战略意义;二是集中资源发展主业,提升

多元化程度,回避全球化竞争;三要实施横向或必要的纵向整合,错过整合的机遇就失去了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机遇;四要基于全球化的需要和自己的弱点,积极实施跨国的横向和纵向购并和联盟。

卢泰宏则发现粤商之所以距离国际企业仍有距离,是因为其DNA缺陷。具体来说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猫型企业家,特点是善于发现机会,动作快,就像猫捉老鼠一样。但猫在自然界中却不是最强的,有致命的弱点,竞争力也不是最强的。二是价值链缺陷。广东工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在“微笑曲线”测试中,低端环节得分最高,高端环节得分并不高。三是产业链缺陷。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完成了升级,把产业转移先后转向日本和中国。其在产业链环节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四是商业文化有缺陷。粤商要实现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必须要继承粤商优秀的传统和基因,在商业模式创新上有所作为,同时也要在商业文化上脱胎换骨。

## 二、粤商文化与传承

程宇宏指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粤商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气质。改革开放以来,新粤商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继承与延续了粤商文化的传统。与西方基督教商人相比,粤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并体现出中国乐感文化的精神气质。“乐感文化说”,是相对于西方基督教“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的中国文化“类型”,从乐感文化的角度解读粤商文化现象,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在中国“乐感文化”传统中,儒家经典《论语》首章首句即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评价学生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而道家哲学中,“乐”也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如庄子提出的“逍遥游”、“至乐”,杨朱所谓“乐生”,构成中国乐感文化中另一支影响深远的幸福观传统。后来宋初学者周敦颐对前来问学的程颢、程颐提出“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即孔子、颜回为什么能在贫贱困苦中保持快乐,成为宋明儒学的重要话题。这种“孔颜之乐”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它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程宇宏认为,从乐感文化出发,可以解析从这些并不具备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精神气质的、20世纪末逐渐崛起的现

代新粤商的精神动力来源<sup>②</sup>。

李慧认为,文化是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成各自的创业环境,应用DDEE创业过程模型,可以分析广东文化对创业过程各个阶段的影响。在创业需求阶段,广东文化使广东人崇尚创业而形成相应的社会氛围,群众了解创业,尊重创业尝试,鼓励创业奋斗,宽容创业失败;社会管理部门同样了解创业,支持创业,在政策上给予扶持;教育培训部门也开设系统的创业课程,讲述相关知识。这使广东人愿意创业,有能力创业,热衷创业。在创业发现阶段,广东人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在发现创业机会上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广东人创业的优势人力资本。广东人敢为人先、敢于冒险的海洋文化,使广东人发现更多的创业机会。在创业评价阶段,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从环境上对创业项目的启动有积极作用,创业者对创业机会风险评价时相对宽松,同样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创业项目涉及行业特性、市场进入、人员组织、财务预算等一系列问题,而这是环环相扣的一个完整系统,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判断失误,将对整个项目造成影响,对创业项目的评价需要综合的知识体系和长期的经验积累。广东人在商场长期的实战经验给予广东人系统的商贸知识,使创业机会得到较客观的评价,从而减少了失败的几率,也减少了错失良机的可能。在创业利用阶段,广东文化中精打细算、勤奋苦干的精神使企业能够低成本运转。创业者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都要经历各种挑战,广东人不畏惧之,同样得益于海洋文化中的冒险精神、不畏艰险的精神。同时,广东人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社会理解企业初期积累的艰辛,对“朴实、苦干”给予肯定的态度。政府同样支持创业者的活动,相关部门尽量简化企业创办的手续,并对中小型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

张红明和黄钻霞从文化解释的角度对岭南老字号品牌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研究。通过对24家知名度高、代表性强的岭南老字号的相关品牌信息的内容分析,总结出10个代表岭南老字号品牌文化内涵的词语,然后对它们进行了归类和分层,接着提炼出岭南老字号品牌精神的词语——神秘、永恒和可信。最后从儒家文化、超自然崇拜和岭南文化的影响三方面对岭南老字号品牌文化内涵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解释。在超自然崇拜心理方面,中国人对祖先、鬼魂和超自然的东西有种崇拜敬畏之情,老字号神秘的配方、独特的工艺以及传奇的故事常常与神仙、道士、鬼神等

超自然的力量联系在一起,所以给人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感和力量感,迎合了人们的崇拜心理。例如,冯了性药厂生产的李众胜保济丸,相传就是创制人李兆基夜里梦见吕祖所赐;黄恒庵的“乌金丸”药方相传是“水鬼”所赐;王老吉的配方是一位道长所传。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老字号以儒家文化、儒家伦理道德、处世哲学作为行为规范,往往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文化认同。广东的老字号精深此道,所以在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传统儒家文化的渗透。如在命名上讲求吉祥高雅,例如“致美斋”让人联想到“精致、完美”;“陶陶居”给人一种“乐也陶陶”的感觉;“王老吉”中“老”代表健康长寿,“吉”代表吉祥平安;“潘高寿”寓意长命高寿;“益和堂”表达“有益、和谐”之意;“广德泰”寓意广施仁德,国泰民安。这些品牌名字寓意正好反映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另外,儒家文化强调家族延续观念和尊崇传统的观念。老字号把祖先的智慧成果世代传承下来,并保持着传统正宗的特色,迎合了人们延续传统的心理。老字号经过历代传承,见证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情系着人们对往事的追忆。在岭南文化的影响方面,岭南老字号植根在岭南文化的土壤之上,受到岭南特殊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现出地道特色的一面。例如,凉茶就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南方饮料,它的产生与人们容易受潮热气候的影响而上火密切相关,所以人们为适应岭南的气候,就孕育了凉茶养生文化。

### 三、粤商创业与创新

邵学言、陈静宁和冯贺喜的研究指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带来了广阔的区域市场,东盟正逐渐成为粤商企业投资的重要地区。不论是在投资空间,还是在投资规模上都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粤商企业在东盟进行直接投资首先要面临的是区位选择问题。他们运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印证了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量和空间距离等是影响粤商企业投资东盟的重要因素。进而测算广东对东盟各国的投资引力系数K,据此将东盟十国划分为强引力型、次强引力型、弱引力型,尝试为粤商企业投资东盟的区位选择决策提供理论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依据。他们指出,广东与东盟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对粤商企业在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成正相关,而且正相关性非常显著,表明广东与东盟各国的经济规模越大,粤商企业对东盟的投资规模越大。广东与东盟各国的距离与粤商的直

接投资流量负相关,显著性明显且稳定,表明空间距离是重要的阻力因素,它影响着粤商在东盟投资的流向和分布。广东对东盟各国的出口与其直接投资存在着正相关性,虽然显著性相对较低,但说明贸易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运用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可以给粤商企业投资东盟的区位选择决策提供理论指引和量化的依据。尽管回归分析显示,目前粤商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对其投资影响较小,但两者的相互促进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近年来,纺织服装、家电、电子信息等行业的粤商企业加快在东盟国家投资设厂,因为这些厂家从广东进口纺织纱线、电子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东盟加工组装后就地销售或出口到亚洲、欧美等地,市场前景良好。在后续研究的拓展方面,邵学言、陈静宁和冯贺喜认为,由于构建模型时通过前提假设把一些不能量化的因素排除,引力模型不涵盖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全部因素,从而使实证分析结果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粤商企业在实际决策过程中,除了考虑引力模型分析提供的参数和结果外,还需要综合考虑模型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如投资软环境、对外资的优惠措施、信息化程度及企业本身具有的优势等。

随着企业所面对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学者开始关注创业导向战略,但是大多数的学者都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而忽视了随着时间的发展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会呈现出周期性变化。苏晓华和王平的研究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构建了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作用的U型变化模型,将针对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作用的研究从静态引向动态,弥补了当今对创业导向研究大多为静态的不足。他们选取了分公司分别处于不同产业生命周期且较有代表性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跟该理论模型的预测较为一致。在案例的分析论证中,比亚迪三个部门的情况跟该理论框架是一致的。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受产业生命周期调节作用的影响,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初期,创业导向对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也即在电动汽车产业,由于比亚迪的创业导向较高,因而其绩效也更高。而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成熟期,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较低甚至有负面作用,在比亚迪的汽车产业,其创业导向较低,通过追求合法性使得比亚迪获得了较高绩效。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后期,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在比亚迪的电

池产业,由于比亚迪的创业导向较高,因而其绩效也比较高。

对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作用,目前国内分析多采用灰色关联度等经验式的方法。结果一般介定在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研究价值意义不大且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在生产函数中知识是否作为独立变量存在,理论上尚未明确,因此选用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有待商榷。二是用TFP直接作因变量有不妥之处。TFP通常是由产出减去相应份额的资本和劳动的残差序列,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适用,在非完全竞争条件下,TFP的估计是有偏差的。三是在罗默的知识外溢模型中,知识实际上是指能够直接被转化的“应用技术”,没有涉及另一类重要的知识——基础知识。四是选用R&D投入或专利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没有重视对创新过程的分解,忽略了成果转化环节对创新绩效的制约。同时也忽视了基础研究的创新成果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基础影响。

鉴于此,吴二娇和刘璟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别对广东省1991~2007年间三大引文系统收录的文章篇数、专利申请量、技术市场成交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及定量关系进行研究,阐明了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及转化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创新产出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和单向因果关系并不成立,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有限,产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创新转化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不具备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却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成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在对广东省有效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现有科技发展模式的缺陷,对加快粤港澳三地的科技合作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新创企业的成长问题是创业研究的重点之一。新创企业的先天性劣势使其死亡率远高于老企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组织的合法性。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化的制度结构,是一种能够帮助新创企业接近和动员所需其他资源的资源。新创企业要想快速成长,就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资源;要想拥有这些所需的资源,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合法性水平。因此,对新创企业来说,如何采取有效的战略行动来获取组织合法性是其快速成长的关键。曾楚宏的研究探讨了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如何采取有效的战略获取组织合法性的问题,他根据来源将组织合法性分为规制

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对新创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的合法性获取战略包括遵从环境、选择环境、控制环境和创造环境,但是不同行业特征和组织特征的新创企业对这些战略的偏好并不相同。具体来说,处于成熟行业、不具备先前相关经验的新创企业适宜采取遵从环境战略,处于成熟行业、具备先前相关经验的新创企业适宜采取选择环境战略,处于新兴行业、具备先前相关经验的新创企业适宜采取控制环境战略,而处于新兴行业、不具备先前相关经验的新创企业则适宜采取创造环境战略。只有这些新创企业采取有效的战略获得的合法性资源总量超过临界值时,才能够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

#### 四、粤商家族与公司治理

作为一种古老的治理模式,合伙制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构成了一道独特风景,打破了公司制在企业治理模式中的垄断地位。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下,合伙制在粤商中都是存在的。

陈和的研究首先从回顾合伙制的效率争论入手,开展了关于合伙制的讨论。他指出,一些学者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合伙制中的团队生产、投入不可观测等弊端容易引致搭便车的非效率行为。另一些学者则为合伙制的效率辩护。当专业性的团队生产不易监督时,合伙制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只要合伙人负无限责任,通过简单的混同策略,合伙制可以实现近似效率。即便合伙人负有限责任,只要存在共同监督,合伙制的效率仍然可以实现。既然合伙制并非低效率的治理模式,一定有其独特机制适于治理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随后,介绍了合伙制中三种治理机制:人力资本的代际培养机制、利润分享机制、人力资本的晋升机制。人力资本的代际培养机制可以克服人力资本在培养下一代人力资本时的时间不一致问题,实现年老合伙人的有效退出。利润分享机制可以维护产品质量,促进人力资本间的合作。人力资本晋升机制能够留住企业内的关键性人力资本,避免企业内的核心资源被非关键性人力资本所窃取;同时能形成企业人力资本间的竞争局面,减少企业内的代理问题。

商会在粤商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张捷和张媛媛的研究从商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出发,用经验数据进行了相关论述。以公司治理为参照系,分析了商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张捷和张媛媛认为,由于非营利组

织的性质,商会治理中缺乏利益攸关的所有者以及来自外部市场的压力,加上治理目标的多元化,激励机制的弱经济性,以及商会与会员之间互为治理对象等特征,商会治理属于一种典型的弱型治理。弱型治理的效率高低主要取决于商会能否利用独特的社会资本优势来弥补其在物资资本和正式规则上的劣势。研究运用项目组对粤、浙两省商会的问卷调查,对我国商会治理的情况作了一些实证分析,初步证明了商会弱型治理的存在。经验证据表明,我国沿海地区商会的自主治理有了较大的进步,商会的治理结构趋于规范化,服务功能发挥较好。但商会的代表功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普通会员参与商会治理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商会在资源、能力、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上都呈现明显弱势,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为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首先,应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推动商会的民间化和自治化进程。其次,应该加快商会的立法进程,改变一业一会的准入规制,允许竞争性行业建立多家商会,以提高会员的同质性,增强中小企业参加商会治理的积极性,提高商会的组织密度,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促使商会逐步由服务型向管理型乃至代表型转型。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倡导商会之间自愿联合,理顺商会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在适度竞争中自发产生代表各类企业共同利益的代言人。

大量粤商企业采取的是家族式经营管理,关于家族企业治理的研究对于粤商发展至关重要。谌新民和余炬文从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的视角研究发现,家族企业是否决定雇用职业经理人,除了经营者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等基本因素外,还涉及社会信用、“家”文化和经理人市场等外部因素和企业发展阶段及激励约束机制等内部因素。尽管由外部人出任经营者公司平均绩效相对较好,但大部分家族上市公司仍采用“家族成员任董事长而由非家族成员任总经理”的折中治理方式。在分析了家族企业经营者的选任机制后发现,经营者的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是影响家族企业是否雇用职业经理人的决定因素,但还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营者选任途径、薪酬状况和公司经营绩效,在经营者的不同选任方式中,董事长和总经理均为非家族成员时绩效最好。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的薪酬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

是,随着家族成员参与经营决策的程度上升,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水平均值也有显著上升,当董事长和总经理均为家族成员时,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均值最高。可见,家族成员也存在日趋明显的自酬趋势。从回归结果看,家族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并无显著相关关系,董事长的薪酬与家族持股比例呈显著弱相关关系,而总经理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由于家族成员出任董事长的比例高,说明家族成员同样有提高其自身报酬的动机。

家族企业是家族与企业的契合体,天然存在着家族雇员和非家族雇员两类代理人,而对于代理人的治理又存在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模式,所以家族企业对于代理人的权衡治理比其他类型企业更具独特性。家族继承意图是家族企业主潜意识的最根本的目的,为了实现家族继承意图,家族企业主必定需要依靠各方面的人,从而产生了对家族雇员和非家族雇员两类代理人进行权衡治理的情况<sup>[3]</sup>。

现有研究普遍关注的是用家族雇员控制非家族雇员,其实在中国,运用非家族雇员控制家族雇员一样非常重要。何轩的研究以广东省内的家族企业为主要样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讨论,五个假设均得到了数据的显著支持。在研究中发现,家族企业主为实现企业的代际传承这一根本意图,会在两类代理人之间权衡,动态地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以达到对决策绩效的最优效应。说明家族继承意图并不是单靠家族成员完成的,它不像管理意图和控制意图那样直接体现为通过家族成员担任关键岗位控制企业,实

现家族继承意图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家族继承意图需要通过契约治理对家族成员的权力进行控制,通过关系治理将外部人力资源内化来实现。这是因为,当企业主与家族成员之间在企业活动中的交往增加时,有了更多的机会考察家族成员的经营能力与相关兴趣,如果企业主观察发现家族成员并不具备经营企业的能力或者对于企业经营根本没兴趣,甚至发现某些家族成员损害企业利益,那么企业主基于企业长远发展的考虑,必定调整原本对其的信任,从而选择契约治理。同时,家族企业主在通过相关考验后,也会对一些德才兼备的非家族成员进行泛家族化式的关系治理,赋予其更多的信任和权利。

“粤商论坛”为粤商研究搭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可供学者、官员及业内人士为粤商发展建言献策。后金融危机时期,粤商如何转型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需要企业、政府和学者密切关注,认真研究,粤商的发展任重道远,粤商的研究亟待开展。**REFORM**

#### 参考文献

- [1]邓可斌等:《粤商经营之道——多元化与专业化的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 [2]程宇宏 黄鹏燕:《粤商文化研究述评》,《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72~76页
- [3]储小平:《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51~58页

(校对:李玲)